



▲“山水寄哲心”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场。 毕鸿/摄

滁州最多情 山水寄哲心

——2025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王诗报

2025年滁州市第三届“滁山与我最多情”阳明文化活动期间,“山水寄哲心”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本地文史爱好者共80余人,围绕“王阳明在滁州”这一核心议题,从思想史、地域文化、文物考古、文旅融合、教育实践、艺术传播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且富有创见的交流与探讨。

溯本清源:滁州在阳明心学发展史上的“转捩”价值与思想实践

王阳明在滁州任职南京太仆寺少卿虽然只有半年时间(明正德八年未至九年中),但多位学者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这短短半年是其心学思想传播与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具关键意义的“转捩点”与“实践场”。

首先,滁州是阳明心学从个体悟道走向社会化、规模化传播的起点。周群、王勇、骆跃泉等学者的研究指出,滁州时期是王阳明继“龙场悟道”、贵阳讲学后,首次在相对安定、闲适的环境中进行大规模、公开化讲学的重要阶段。其“地僻官闲”的职务特性与琅琊山清幽秀美的自然环境相结合,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讲学空间。王阳明创造性地将讲堂从封闭书斋移至开放的山水之间,尤以龙潭夜坐、环潭歌咏最为著名,“月夕则环龙潭而坐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这种融入自然、充满诗性与仪式感的讲学方式,极具吸引力,迅速聚集了四方学子。“从游之众自滁始”,滁州是王门游学的发端,也标志着阳明心学开始突破小范围的师徒授受,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传播。

其次,滁州是阳明教法与思想深化的重要过渡与孕育期。周群等学者深入分析了滁州阶段在阳明“教三变”(从“知行合一”到“静坐”,再到“致良知”)中的位置。贾鸿彬指出,滁州时期,王阳明因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故“姑教之静坐”,以收“放心”、体认心体。但此时他的“静坐”已非单纯的佛道式枯寂,而是与“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紧密结合,旨在达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静专”。周惟熙、夷风对“四句教”的阐释,以及胡中友对心学融摄佛道思想的分析,为理解滁州时期的思想背景提供了哲学根基。杨朝蕾则创造性地提出“山水道场”概念,认为滁州山水被阳明激活为一个独特的修行与教学空间,其诗中展现的“静坐证体”“游观磨练”“随机点拨”,正是心学工夫在自然场域中的生动实践与诗意呈现。

再者,滁州是“知行合一”理念从哲学命题转化为具体社会治理实践的试验田。王勇、骆跃泉等学者都关注到,王阳明在滁并非空谈性命之学。他利用太仆寺少卿的职务之便,积极推行教化,改善民生。例如,改废弃尼寺为太仆寺仓,谋划创建龙潭街(马政街),召集军民定居,免租耕读,设立保甲,巡防护卫。这些举措正是其“知行合一”“亲民重教”思想在地方治理中的直接体现。张祥林对南京太仆寺官员“崇王”情结与心学倾向的研究,揭示了阳明离开后,其治事理念与心学思想如何通过后来的太仆寺官员得以延续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滁州的地方文化建构与社会风貌。

稽古鉴今:滁州阳明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空间重构

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对滁州现存阳明文化相关历史遗迹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鲜明导向。

对核心遗址“柏子灵湫”(龙潭)的聚焦研究,徐茵、高山、王浩远等多位学者的发言,共同构建了柏子龙潭从汉代采铜遗址,到宋代官方祈雨场所,再到明代因朱元璋祷雨灵

验而鼎盛,并因王阳明讲学而注入心学内涵的完整历史脉络。学者们指出,柏子潭文化价值独特而深厚。针对当前遗址保护现状,学者们一致呼吁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修旧如旧”地恢复龙潭及相关建筑的历史风貌,避免臆造和错漏。

对琅琊山东北麓历史人文景观的整体性保护利用思考。罗志的发言具有宏观的战略视野。他尖锐指出了当前丰乐亭、南京太仆寺遗址、龙潭、龙池街等区域存在的保护零散、开发脱节、城市肌理割裂等问题,并提出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打造全域文化景观、营造宜居宜景社区“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新史料的发现与考证为历史图景复原提供支撑。臧龙关于新发现明代吕维祺《梦游醉翁亭记》佚文及残碑的考证报告,为研讨会带来了惊喜。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醉翁亭文献宝库,文中对明末滁州众多景点的详细描述,为复原当时的人文地理格局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同时也展现了明末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游观哲学。计文渊对王阳明《月夜诗卷》墨迹真伪的严谨辨析,则体现了学术研究去伪存真的求真精神,为滁州可能涉及的相关文物鉴定与展示提供了学术依据。

融合创新:阳明文化的当代传播、教育赋能与文旅转化

面对如何让古老的阳明心学在当代“活”起来、“热”起来的问题,学者们从传播学、教育学、文化产业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文旅融合的纵深发展路径。苏俊七、苏

明辰提出的“文纵横横”战略颇具启发。“文纵”强调深耕“王阳明在滁州”这一独特历史品牌的文化真实性,开发具有深度的主题文旅产品和母本内容,避免同质化竞争;“旅横”则主张运用全媒体矩阵进行创新传播,并实施“情感滁州”战略,利用阳明诗中“滁山与我最多情”等情感纽带,打造有温度、能共鸣的旅游体验,推动旅游从“景点打卡”向“文化沉浸”与“心灵对话”升级。严晓宇从一线导游的实践出发,提出了差异化讲解、场景化体验、互动化践行等具体、可操作的传播策略,强调导游作为文化“翻译者”和“实践者”的关键作用。郭笑彤另辟蹊径,从王阳明“喜食鱼”的饮食偏好入手,结合《醉翁亭记》“溪深而鱼肥”的意象,探讨开发特色美食、打造美食文旅线路的可能性,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新颖的“微视角”和“烟火气”。

教育领域的价值启示与实践探索。阳明心学蕴含丰富的教育智慧,多位学者探讨了其在当代教育,特别是心理健康和人格培养方面的应用价值。聂辉系统阐述了在智能时代大学生面临认知迷失、意义虚无等困境下,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构建了课程、咨询、文化、数字“四位一体”的融合体系。储昭兴则聚焦儿童教育,主张借鉴心学尊重主体、强调“事上磨练”、致良知以“成人”的理念,纠偏功利主义教育倾向,促进儿童生命的整体成长。和建伟进行的王阳明与卢梭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在更广阔的哲学与教育史视野中,揭示了二者在批判现实、重塑人格方面的异同,为思考中西教育理念的融合与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深刻参照。

当代传播的社会心理剖析与区域协作倡议。刘海涛对当前“王阳明热”的受众差异及其社会心理的探析,冷静而深刻。他分析了心学在商业人群、普通大众、精英学者等不同群体中被接受、疏离或批判的复杂心理动因,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播中面临的深层困境与挑战,提醒文化传播需注重分层化、精准化。王海林则发出了推动区域协作的强音,倡议以阳明文化为纽带,建立滁州与广西(阳明晚年建功立业之地)等地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挖掘和弘扬阳明

思想的时代价值,为阳明文化的传承创新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格局。

脉络交织:阳明学的多维学术视野与地域特色

研讨会不仅聚焦滁州,也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阳明学研究领域,展现了阳明学丰富多元的学术脉络与地域形态。

跨地域、跨流派的学术网络勾勒。周凯所作的《明代滁州阳明学与诸理学流派活动系年》,以翔实的史料编年形式,全景式展现了明中后期滁州作为理学传播枢纽的生动图景。其中不仅记录了阳明学派在滁的持续活动与建制化过程,也涵盖了湛若水甘泉学派、程朱理学家等与阳明学者的交流、论争,清晰勾勒出复杂而活跃的学术人物网络与思想交锋现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明代地域学术生态的理解。

地域学派的思想特质研究。张山梁对福建地区阳明学“朱王会通”基本特征的论证,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地域化学术个案。他指出,无论是治理理念的相通,还是闽阳阳明后学的兼容实践,抑或是闽籍学者的兼收并蓄学风,都体现了福建阳明学在深厚的朱子学传统背景下,呈现出融合朱陆、注重经世致用的鲜明地域特色。

个案研究与思想传承。王亚斌对王阳明重要滁州弟子戚贤的心学思想研究,以及张宏敏对阳明后学参与地方志编纂活动的梳理,分别从个体与群体、思想与实践的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现了阳明学如何通过门人弟子的接力,在地方社会深耕、展开并反哺于文化建设。

本次“山水寄哲心”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共同确认了滁州在王阳明生平与心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度解读了其“山水道场”中的哲学智慧与实践精神,系统梳理了与之相关的文化遗产,并积极谋划其面向未来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之路。

研讨会表明,“王阳明在滁州”不仅是一段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能够连接古今、活化资源、启迪当代的宝贵文化品牌。



▲阳明文化研究专家实地考察建的南京太仆寺衙署。 毕鸿/摄



诗文音乐会。《龙潭弦歌》致敬阳明。 毕鸿/摄



阅读电子化的时代,稀罕看书。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只是选择性看书,看好书,或只看当下有意义的书。对我来说,《田园》就是一本值得久置案头的有意义的好书。

大约四年前,从未谋面,几无交集的于雷突然传过来他的散文手稿,说是要结束出版,请我作序。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谦恭,这个刚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连个拱手都没有,就这么凭空走进我掌中来,我一时竟不知

如何接招,只在心里诧异:莫非现今社交已进入高速高铁阶段……

我的眼睛和精力使我做不到在手机电脑上看完他的二十几万字的电子文稿,于是建议他发一份纸版来完成我的“阅后感”。谁知之后,却一直再无消息,作序的事不了了之。前不久,刚跨入35岁的于雷突然造访,赠予这本《田园》散文集,现在为他作序的是两位陌生人。我郁闷并暗自埋怨这位莽撞的晚辈作者,临阵换将也不吭一声。可是当我读完全书,也就释然了。特立独行,率性而为,应该是诗人作家区别于庸常习俗的重要特征,我理解并赞同。

于雷(笔名雷雷)1989年生,滁州定远人。读万卷书不可知,行万里路决非言过其实。他二十来岁时,就有诗与远方的梦想,在父母的支持下,只身远赴祖国的边陲新疆。他不是一名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风土人情的探究者。

书苑滁风

于雷的“苦旅”

□作者:李广法

纵览《田园》,新疆见闻、西部风情类文章占有全书近半的内容,是一个年轻人睁眼看世界带来的好奇和惊喜的真实记录。从书名上即可一瞥端倪:《在阿瓦提》《喀什见闻》《库车记事》《新疆情》等等。在阿瓦提,他去阿凡提餐厅吃汤面,见识了颇有情调的十二木卡姆、达瓦孜、热尔甫,还有满街巷的卖馍卖铁器铜壶的。他听老艺人快乐的弹唱,还和维吾尔族男女老少跳麦西来甫,或者一个人坐在叶尔羌河边,望着夕阳下镀金般的胡杨林。有的文章融古今史料,立体地展示了新疆的厚重,像是写到喀什,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班超、法显、玄奘先后来到这块土地,讲述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于雷对祖国西部的表情、倾情,不惜浓墨重彩咏之颂之,感觉到很受另一位当代散文大家余秋雨的影响。余秋雨的融地理、历史、民族、史学于一体的文旅散文,开创一代文风,于雷的《田园》颇似小一号的《文化苦

旅》。我不是将两者作无意义的比较,而是认为年轻的于雷有这方面的志向,心慕手追,同样有田园原马的英姿。

《田园》还有许多记述日常和表明心迹的作品。在《梅村》里度过难忘的童年,良田、阡陌、池塘、石子路、瓜果蔬菜等,构成记忆中单纯的因子。《三十述怀》颇为老道,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火热开放的夏季”。他不无感慨地说:“人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去充实自己,安慰自己的灵魂,即使是一棵小草,也要充满蓬勃的热望,去迎接每一日的朝阳。”于雷博览群书,他读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一个“静”字,使他联想到《说文解字》中,“静”字可拆分为“青”和“争”;而青为初生物颜色,争字则是一种持引、坚持的形象。因此,“静的释义不难理解为不受外在滋扰而坚守初生本色”。他在这篇《初心》的文章中,对“原本的初心,被争吵、争斗、嫉妒、暗算、虚荣、攀比的行为消磨得干

干净净。”充满了鄙视和义愤。

书中还收入了多篇写人叙事的文章。《眼中的张放齐先生》和《老知青张继富先生》,两位张先生都是下放的知青,父辈级的。某地某时偶尔相识相交,前者赠他书法作品,于雷父亲惊呼:“我平生再也没有欣赏过这么一副绝好的书法作品……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难得。”后者十分热情地教他新疆舞,让他这个内向腼腆的大男孩敢地在公园街头走进优美的旋律。对本土的作家艺术家他也不吝赞美之词。他写书画家沈辰女士的艺术成就,写她的刻苦努力,写她的奉献精神。他写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李希华的交往,请教小说创作,由衷地敬佩李希华是一位真正做学问的人,是最敬佩的长者!

《田园》的语言十分的流畅成熟,在同年龄作者中似乎更为突出。比如写落叶:乡村的小道上刮落了树叶,就像是一群耗子被从树上赶了下来,在地上滚来滚去。比如他饱蘸深情感叹:这就是新疆,一个人文气息浓厚,集天下自然风光之大成的地方;这就是新疆,一个日日生发情怀,处处找寻幻梦的地方;这就是新疆,一个灵感汇聚,大笔挥洒的地方;这就是新疆,一个放荡性情,任意畅享的地方;这就是新疆,一个寥若晨星,堪比天高的地方;这就是新疆,一个爱之于人,人人爱之,不一般的绝版天堂。